



与会嘉宾参观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图片展。



牡丹花点缀龙门石窟。

本文配图均由论坛主办方提供

为“16+1”合作注入文化力量

本报记者 邹雅婷

4月10日，由国家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河南省文物局、洛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在洛阳开幕。来自中国和中东欧16国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围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管理、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主题，聚焦“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进行为期两天的交流与对话，共同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务实合作。

认为这次论坛非常重要，能够让中东欧各国的代表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遗产，同时也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欧洲的遗产，我们可以交流对话，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

论坛期间，与会嘉宾参观了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洛阳博物馆、龙门石窟等地，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遗产的魅力。

效益。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余江宁告诉记者，正在进行的“数字龙门”项目，通过三维扫描、数据建档、虚拟转化、3D打印等现代科技手段，让龙门石窟更好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万佛洞的虚拟修复已经列入了今年的重点工作计划。”余江宁说，“在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残损的佛像进行虚拟修复，就像时光倒映一样将石窟最初开凿的状态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挖掘背后的故事，用视频短片讲述石窟的前世今生。”

促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是中国与中东欧各国共同创建的合作平台，是落实《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索非亚纲要》、深化拓展“16+1合作”（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创新举措。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获得了中东欧各国的积极响应，16国均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文化遗产国际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动车组’。”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

2017年5月，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办。今年，这场国际学术盛会首次来到中国，落户古都洛阳。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文化遗产都非常丰富，我们的友谊由来已久，在保护文物方面已经开展了重要的合作。论坛首次在中国举办，成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领域的一大盛事。我坚信，我们将会在将来继续开展成功的合作，为增进我们的友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进一步的贡献。”波黑民政部副部长苏瓦德·扎非奇代表中东欧国家致辞时说。

记者了解到，与会的外方代表中不少人是一次来到中国，他们对于此次活动充满了兴趣和期待。捷克文化部文化遗产保护司司长伊里·瓦吉奇纳尔用“奇妙”来形容他对古都洛阳的感受。“中国和捷克之间在考古、展览、遗迹保护等方面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希望此次论坛能推动双方进一步的交流合作。”伊里·瓦吉奇纳尔说。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国家，我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很感兴趣。”波兰国家遗产局世界遗产分部首席专家芭芭拉·弗耶尼克告诉记者，“我

探讨城市与遗产和谐共处

“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是此次论坛的重要议题。“这些年中国发展得很快，搞了很多城市建设。如何处理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考验。中东欧各国现在也处于发展阶段，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个议题一提出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说。

保加利亚文化部文化遗产、博物馆与艺术司处长伊凡·科列夫分享了内塞伯古城的保护案例。内塞伯古城是保加利亚唯一一处包含城市区域的世界遗产地。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于遗产地内的新建项目失去了管控，导致曾经以真实性著称的内塞伯古城差点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随后，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监督下，内塞伯当局和当地居民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制定总体规划，根据文化遗产法案出台新的古城保护制度，记录和拍摄未发掘的考古遗址、街景和中世纪教堂等，分阶段拆除非法建筑，每年开展关于水下文化遗产的研究，等等。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让内塞伯古城重新焕发生机。

澳门文化局文化遗产厅高级技术员关俊雄说，“澳门历史城区”是澳门重要的遗产和资源，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具有突出的地位，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为使这一文化遗产得以永续传承，目前，澳门特区政府正在完善和推进《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的行政法规草案编制及相关的立法工作，期望编制的《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能为“澳门历史城区”带来更全面的保护。

龙门石窟是洛阳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龙门石窟推行“互联网+文物+旅游”模式，在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前提下，也为洛阳市带来了经济

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务实合作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引领和“16+1合作”机制的不断推动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呈现良好态势。据刘玉珠介绍，中国与塞尔维亚签署了关于促进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启动了塞尔维亚巴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合作项目。中国与罗马尼亚就签署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协定达成一致。

对于未来“16+1”文化遗产合作，刘玉珠提出了着重加强统筹协调、做大对话平台、聚焦务实合作、协同国际行动等四方面建议。刘玉珠表示，中方正在积极推动将文化遗产国际合作整体纳入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体系，为“16+1”文化遗产合作提供支撑和便利，力争将文化遗产论坛办成跨国跨区域对话协商和友好合作的创新典范。

柴晓明认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交流合作可以是全方位的，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理念和方法，到考古发掘、文物古迹修复项目等。“中东欧国家的文化丰富多彩，文物保护技术和专业素质也比较高。我去过塞尔维亚，他们的研究机构规模不大，但工作做得很棒。我们跟他们有好多东西可以相互学习。”

参加论坛的外方代表也表示出强烈的合作意愿。波兰国家遗产局首席考古专家阿格尼耶斯卡·昂尼斯佐克说：“我们希望在科研学术方面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将专家学者汇聚到一起，提出文物保护的解决方案。比如如何保护石质文物、纸张等，希望能从中国获得更多经验。”

◎美在生活

春日赏花

□斯尔然

北京香山黄叶村里有间仿古式酒楼，叫“杏花烟雨酒家”。北国春迟，也无烟雨，虽已是阳春三月，漫山未见一朵花开。唯独这间酒楼庭院中的杏花树发似锦，远望一片胭红，引来诸多赏春人。游人明知是在杏树枝头插上了布花，却也看得仔细，久久不愿离开。

国人爱花，自古即有传统。屈原“披薛荔兮戴女萝，赏岸芷汀兰之芬芳”；陶渊明隐居乡间，“采菊东篱下”；李白在花间饮酒，举杯邀月；隐士林逋孤山养鹤，以梅为妻……

虽然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卉开放，但春季无疑是百花争奇斗艳最为热闹的时节。春日赏花，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习俗。上古时期，每逢三月初三上巳节，男女手持蒲（jiān）兰，游春赏花于溱（zhēn）水、洧（wèi）水间，交往时以芍药相赠。“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诗经·溱洧》）青年男女在明媚春光下赏春花、抒春情，芍药既是结情之约，又有惜别之意。芍药一名“将离”，即是由此而来。据宋人记载，“帝相时，条谷贡桐、芍药。帝令羿植桐于云和，令武罗伯植芍药于后苑。”帝相为夏时君王，若此说为真，则国人栽种芍药观赏可追溯到夏。

桃花或是国人心中最能代表春天意象的花卉。随意从《周南·桃夭》中伸出一枝来，便成为对女子的礼赞：“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花盛开在仲春时节，恰是周礼所定男女欢会之时。仿佛是共情而生，长出春心的颜色，花瓣重重叠叠，花蕾深处有一颗红蕊，像是多情人点上的朱砂。古人膜拜于桃花的妩媚妖娆，用“灼”字形容初绽的桃花，宛若新嫁娘的面色，令人心醉神迷。

唐人崔护，曾于仲春之时在长安城南踏青，见一座桃林拥裹的庄宅，遂叩门求水。应门的是一个面如桃花的女子，对他顾盼有情。此般花间邂逅，从此便不能忘。来年再去，见桃花依旧，宅门紧闭，只得在门扉留一首《题都城南庄》，怅然而归。“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个唐代女子，恐怕想不到纵然是身已逝，千年后却仍流传着有关自己的传说，在无数个桃花盛开的日子里，撩拨起人们心头的缱绻惆怅。



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

唐人赏花去处也多。长安多有花园：大慈恩寺有牡丹园，唐昌观有玉蕊花，玄都观种着千树桃林。暮春时节，牡丹花开，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为之倾倒。柳宗元《龙城录》记唐高宗与群臣宴赏牡丹。长安百姓亦醉心于牡丹之美，“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赏花人中更有刘禹锡，作《赏牡丹》，一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成为千古绝唱。

赏花、爱花人多，带来鲜花市场的兴起。唐时，长安、成都、扬州等大都市皆有花市，市民可以在花市买到牡丹、杏花、芍药、茶花等。“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春天里，买花人、看花人络绎不绝，花市热闹非凡。

至宋，又有更多赏花故事。陈师道《后山谈丛》曾记载广陵（即扬州）赏芍药的盛事。广陵芍药有一“红叶而黄腰”的名贵品种，称“金带围”，因其形似身穿红色官袍、腰系金色腰带的宰相，且格外稀有，故开花时被视作当地要出宰相的吉兆。韩琦镇守扬州期间，适逢“郡圃开金带围四枝”，邀王珪、王安石、陈升之赏此花。四人簪花试酒，经年后竟皆为相，堪称传奇。扬州城中，花相芍药曾对四位宰相，此般际遇，也可睥睨牡丹了。多年后，姜夔辗转来到此地，于冷月清辉中见桥边一朵红芍，花事不随人世改，依旧烂漫。姜夔未簪花赏玩，只是在夜风中长叹：“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花开绚烂，恰似盛放的青春。古人赏花时，自然地将鲜花与青春韶华联系在一起。久居深闺的杜丽娘到后花园游玩，被满园春色所震撼。“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怒放的鲜花唤醒了杜丽娘的青春意识，激起了她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从此便“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春花虽美，却不当驻，于是有了“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有了“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古人常因落花而起伤春之情，慨叹世间好物皆不久长。“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林黛玉赏花、惜花、葬花，从漫天飞花中观照到自己凄丽的人生。

时至今日，科技的发达让奇花异卉不再新奇罕见，开花的时节、花期的长短都可以人为控制。今人不再似古人那般多愁善感，但赏花的热情却不减分毫。尤其是久居水泥森林的都市人，更渴望从花红柳绿中感受自然的气息。为了观赏最美的花景，人们不惜跋山涉水。洛阳的牡丹，苏州的杜鹃，林芝的桃花，婺源油菜花……更有人飞越重洋，去异国赏樱。

赏花的习俗盛行千载而不衰，一代代赏花人赋予了花儿丰富的精神内涵与价值意蕴。花不仅是审美对象，还是朋友、知音、恋人。人们歌咏春光和百花，也寄托着自己的情感、信念与理想。



老树画作

网络图片



砖塔胡同路口的砖塔 网络图片

老北京人常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历经岁月洗礼，每一条胡同背后都有一段尘封的历史，值得好好品味。

最古老的胡同：砖塔胡同

位于西四南大街，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元代李好古的杂剧《张生煮海》中，张生问梅香：“我到哪里寻你？”梅香说：“你去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这表明胡同在元代就已出现，而砖塔胡同则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

砖塔胡同因胡同东口一座八角七重檐的青灰色砖塔而得名。此塔名为“元万松老人塔”，为纪念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老师万松老人而修建。元明清时期，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曲艺娱乐场所，关汉卿曾

北京胡同之最

本报记者 施芳

在砖塔胡同居住，并创作了《窦娥冤》。1923年，鲁迅从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61号（现84号），在这里写出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和《肥皂》《中国小说史略》等作品。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曾居住在砖塔胡同43号（今95号），在这里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最长的胡同：东交民巷

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路，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全长1552米。

东交民巷原是明清两代“五部六府”所在地。清乾隆、嘉庆时期曾有“迎宾馆”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鸦片战争后陆续设立了英、俄、德、法、美、法等11国在巷内设立联合行政机构，还开设了美国花旗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日本正金银行及若干教堂、医院，留下许多风格各异的西洋建筑。与其它有着浓郁京味的老北京胡同不一样，东交民巷是一条洋味十足的胡同。

最短的胡同：一尺大街

位于杨梅竹斜街西段，全长30多米。老北京胡同的缩影，具有鲜明的老北京文化特色。清末进士陈宗蕃1931年所著《燕都丛考》中写道：“自杨梅竹斜街而西曰一尺大街，又西曰琉璃厂。”一尺大街上原有6座店铺，路北3家都是刻字店，路南3家是酒馆、铁匠铺和理发店，充满了生活气息。从一尺大街穿过就可以到达北京著名的文化

街——琉璃厂大街，这里因为集中了很多古玩字画店而出名。

最宽的胡同：灵境胡同

东起府右街，西至西单北大街。最宽处32.18米。明朝时，灵境胡同分东西两部分，东段因坐落有灵济宫得名，西段南侧有宣城伯府，因此称宣城伯后墙街。民国后，灵济宫所在地根据谐音改名为灵境胡同。如今，灵境胡同已是一条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毗邻西单商业圈，是购物休闲的好去处。

最窄的胡同：钱市胡同

位于珠宝市街西侧，最窄处仅0.4米。钱市胡同有多窄？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可以通过，两个人就需要侧身让路了。钱市胡同是清代官办的银钱交易“钱市”的遗存，胡同也因此得名。有的院落至今保存着清光绪年间的木架构天棚，有的门框上还钉着当年“京师商务会”的铁牌照。

拐弯最多的胡同：九湾胡同

位于珠市口西大街南侧，弯曲之处多达13处。北京的胡同多是直来直去，九湾胡同却不一样，光是接近90度的弯就有9个。从东到西不过380多米，直弯、急弯、斜弯、缓弯比比皆是。胡同早年由河沟衍生而来。明代因有一小庙得名，称般若寺胡同。清末因胡同弯曲多变，改称九曲湾。此后更名为九湾胡同。